



上册

罗斯福 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

[美] 罗伯特·达莱克 著

商务印书馆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

上 册

[美] 罗伯特·达莱克 著

伊 伟 丁耀林 张震久 陈启迪 译

白自然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

下 册

〔美〕罗伯特·达莱克 著

陈启迪 王伟明 马 宁 郑昭彬 译

白自然 马清槐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根据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本翻译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
(上册)

[美] 罗伯特·达莱克 著
伊 伟 丁耀林 张震久 陈启迪 译
白 自 然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44-1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48 千
印数 7,800 册 印张 14⁵/₈
定价：1.80 元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根据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本翻译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
(下 册)

[美] 罗伯特·达莱克 著
陈启迪 王伟明 马 宁 郑昭彬 译
白自然 马清槐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44-2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4 千

印数 7,800 册 印张 12³/₄

定价：1.6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罗伯特·达莱克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获得美国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和美国人文学基金会的资助，离教两年，专门研究罗斯福总统时期（1933—1945）的美国对外政策而写成了这部著作。其资料来源除二百余种专著外，尚有美、英政府在七十年代后期首次公开的档案资料、罗斯福本人以及他的助手和僚属的文件、日记手稿、书信等。本书逐年叙述了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

罗斯福在1933年出任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遭到经济大危机的袭击，美国经济也濒于崩溃。为了摆脱危机，罗斯福一方面在国内实施“新政”，另一方面他会同英、法等国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寻求解决分歧、克服危机的办法。1933年，他同苏联建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罗斯福政府持所谓“中立”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入同盟国参战。此后，罗斯福同英国、苏联和中国等先后举行会议，商讨反法西斯的战略和军事部署等问题。

本书虽然主要是叙述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但也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法、德、意、日和蒋介石政权等的对外政策。这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籍，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整个国际关系，并可从中汲取某些历史经验教训。

罗斯福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个颇有远见和魄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所实行的政策在国内首先是于其本人有利，在国际上首先是于美国有利；他深知应该如何巧妙地协调人

民的情绪、国会的态度和国内的舆论而又不损害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动权。对此,本书论述颇多。

本书的译者是:卢艳丽(序章)、伊伟(前言、第一、二、三、四章)、丁耀林(第五、六、七章)、张震久(第八、九、十章)、陈启迪(第十一、十二章)、王伟明(第十三章)、马宁(第十四章)、郑昭彬(第十五、十六章及后记)。全书除第十四章是由马清槐同志校订外,其余是白自然同志校订的。

1983年6月

目 录

前言	1
序章 一位美国国际主义者	5

第一部分 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

1932—1934

第一章 当务之急第一	33
第二章 带来希望的外交	51
第三章 ……与民族主义	86
第四章 告别国际主义	115

第二部分 既是孤立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

1935—1938

第五章 杂事纷呈,穷于应付	146
第六章 踌躇不前	176
第七章 姿态	209

第三部分 外交政策内幕 1939—1941

第八章 有限的影响	246
第九章 勉强的中立	288
第十章 冲突和妥协	339
第十一章 通向战争的曲折道路	395

目 录

第四部分 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

1942—1945

第十二章 为团结而斗争·····	459
第十三章 权衡需要·····	522
第十四章 联盟政治·····	582
第十五章 1944年:胜利与怀疑·····	633
第十六章 和平将来临吗?·····	693
后记 罗斯福——对外政策的领袖·····	754
关于引语出处的说明·····	766
参考文献目录·····	768
索引·····	793

前 言

本书有两个意图：一是为了适应人们的需要，以一本书的篇幅综合研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再者，是想重新探讨关于这一主题中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重新研究罗斯福外交方针的大好时机。在此期间，这方面的专著大量问世，而且一般来说皆属佳作，加之美国 and 英国收藏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关于外交关系的档案几乎全部可供使用，这就使我对罗斯福传记的主要部分，特别在战争年代的部分，能够重新评价或订正。我认为，在下列重大问题上，人们对罗斯福的意图至今未能充分理解：如 1933 年伦敦经济会议、西班牙内战、“检疫隔离演说”^{*}、慕尼黑会议、1940 年威尔斯使命、1941 年大西洋会议、美国参战、战时对俄和对华政策、无条件投降理论的起源、托管制、摩根索计划和原子弹等等。

正象许多人评论过的，罗斯福的行动是难以解释的。罗斯福的顾问和传记撰写人之一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曾这样写道：“[他]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思考过程。他宁愿让后人相信，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是简单的，轻易就可以处理的，……而不肯承认自己也曾因举棋不定而苦恼，……因错误而忧虑。”一次，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对罗斯福说：“……你是我历来遇到的最难共事的人之一。”总统问道：“是因为我有时太刻薄了吗？”伊克斯回答说：“不

^{*}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七·七”事变后，罗斯福于 1937 年 10 月在芝加哥发表一篇演说，大意说：世界各国息息相关，战争如同瘟疫，一经爆发，势必蔓延，必须实行检疫隔离，以反对侵略。靠“中立”或“孤立”不能避免战祸，等等。这个演说被称为“检疫隔离演说”。——译注

是,而是因为……你即使对忠于你的人也不能开诚相见,……你总是把牌捂在胸前,从来不摊到桌面上来。”

我在剖析罗斯福的言行动机时,并没有求助于什么特别技巧。我的方法不过是把当时罗斯福活动的来龙去脉尽量完整地重新展现出来。这样,我们就象看万花筒一样,只见一连串不断变换的压力把罗斯福从一个立场推向另一个立场:他自己的主见、国内的重要问题、国外的事件——有时是其中之一,有时是综合而来——决定了罗斯福的外交行动。研究罗斯福这个人,难在不易判断每个特定时期内影响他的究竟是哪一种力量。本书提出的某些答案肯定会引起争论,但是这只会带来有益的结果。罗斯福总统任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很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我们的国家将世代代关心这一课题,并会从中获得取之不尽的教益。

本书是在一些人士和机构的帮助下写成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W·莱文教授对全部原稿提出详尽而又发人深思的批评。特别令人感激的是,他促使我在解释罗斯福行动方面重新考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老朋友和同事理查德·韦斯教授也审阅了全稿,并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深刻的意见。同样重要的是,在我写作过程中,他热忱地听我阐述我的见解,并随时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我在写书的过程中吸收了这些意见。拉特格斯大学的沃伦·金布尔教授正在编辑一部权威性的丘吉尔—罗斯福通信集。他向我介绍了这些信件的内容及详细出处,从而使我在熟悉这样浩瀚广泛的材料时减轻了负担。他还审阅了1939年—1945年期的稿件,并提出了许多有关阐述方面的宝贵意见,并建议我应增添哪些有用的内容。在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的罗伯特·杰维斯教授和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克里斯托弗·索恩教授讨论本书的内容

时，他们也帮助我澄清了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E·柳奇坦伯格教授向我推荐了罗伯特·W·宾厄姆文件和詹姆斯·法利文件的有关资料，并帮助我取得了研究基金，使我能摆脱教学工作的羁绊；西北大学的理查德·W·利奥波德教授、哈佛大学的欧内斯特·R·梅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茨·斯特恩教授都积极相助，支持了我对研究基金的申请。

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和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为我提供的经费，使我获得整整两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埃莉诺·罗斯福学会为我旅行及复制资料提供了为时一年的慷慨资助。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术评论会为我这项工作提供了一系列的资助，长达数年之久。

感谢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逐项查阅该图书馆收藏的丰富的资料。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该图书馆馆长威廉·R·埃默森博士和前副馆长威廉·J·斯图尔特。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几次前往海德公园*调查访问，所获得的成果可能超出他们的想象，而且令人深感兴趣。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弗吉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学校的图书馆手稿收藏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局、英国政府档案局的工作人员。

在此，我还要感谢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那些卓越的人士。谢尔登·迈耶副经理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此书的工作，并在整个长期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给我极其可贵的鼓励和建议。本书的责任编辑利昂娜·卡普莱斯和编辑安娜贝尔·蒂勒尔使我避免了无数的差错。为此，我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纽约州的住所，位于赫德森河畔。——译注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杰拉尔丁·R·达莱克对我的耐心支持。她理解这项工作,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批评,这不仅使本书水平有所提高,而且使之较为通俗易懂。

罗伯特·达莱克

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1978年6月

序章 一位美国国际主义者

我们暂且不提他的堂兄西奥多*。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自 3
1825 年约翰·昆西·亚当斯任美国总统以后入主白宫的首屈一指的世界主义者。他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母亲萨拉·德拉诺·罗斯福是赫德森河谷的贵族，他们习惯于寄居国外，周游旅行。富兰克林是在 1885 年三岁时被带进欧洲的。其实，留在他记忆中最初的事情，只是在那年 4 月，他全家从英国返回美国的航行中，海水进入了船舱，冲走了他的跳娃娃。在他七岁到十五岁期间，他每年要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度过几个月。在那里，他的父母结识了一些同他们地位相同的欧洲人。

1889 年—1890 年间的国外生活是富有特色的。全家人首先来到英国，在那里“詹姆斯兴致勃勃地同休·乔姆利爵士一起狩猎”；在“拉特兰公爵的贝尔沃堡——英国最美丽的城堡”，“尽情地骑马和打猎”。六个星期后，他们来到了法国。富兰克林在凡尔赛的公园和花园里玩耍，在巴黎的杜伊勒利宫游逛，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和树林中散步，也曾陪着父亲登上“使人感到晕眩的”爱弗尔铁塔顶，对这座如同“摊开了的地图一样的伟大城市”赞叹不已。那年冬季，他们来到了法国南部的矿泉疗养地波。富兰克林在那里的活动如下：同警察塞西尔·福尔贾姆一起散步观鸟；每天早晨骑着他那匹矮小的马驰骋两小时；他父亲同洛德·克兰威廉海军元帅讨论海军事务时，他在一边听着；参加“纽金特太太家”为孩子们举行的圣诞节晚会。随后几年，詹姆斯在巴特瑙海姆疗养，而这期间

* 西奥多·罗斯福的甥女埃莉诺·罗斯福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译注

富兰克林就骑着自行车来往于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地方；到拜罗伊特去看歌剧；攀登黑森林的布劳恩山。

即便是在海德公园的家里，富兰克林也经常回想起他的世界旅行。《伦敦新闻画报》每星期都刊登许多图片：有霍恩佐伦和哈普斯堡的景色、“游行队伍和宫殿，从巴黎、伦敦到维也纳和从矿泉、猎射狐狸到化装舞会上的国际社会的活动”。在他五岁到十一岁期间，欧洲籍的家庭女教师教他学德语和法语，帮助他打下初步基础；到他出任总统期间，他还稍能讲两种语言。¹

4 1896年秋，富兰克林在格罗顿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在此期间，外国的情况继续在富兰克林的生活中产生影响。格罗顿象当时其他第一流的美国寄宿学校一样，仿效英国的教会学校或公学，开设拉丁、希腊、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古典课程，也把培养“果敢的基督教徒的性格”作为首要的中心任务。

也就是在基督教徒这一点上格罗顿给富兰克林的思想上带来尤其重要的影响。他从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兼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那里所学到的，就是为时乖命蹇的人服务的基督教绅士们的理想：即坚信拥有特权的美国人将在解除国内和国际间的疾苦中起作用。皮博迪付出巨大的努力教诲他的学生们时刻牢记这些人间疾苦。他的图书馆藏有当时最主要的杂志，他还主张学校办的杂志应登载一些社会问题的论文，并引导学生们讨论当前的的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主题是：发展海军，兼并夏威夷，英国和美国对中国领土完整所负的责任，菲律宾的独立问题，布尔人的战争，等等。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完全遵循皮博迪办学宗旨的最优秀的学生，名列第一。他加入了学校的教会团体，给《格罗顿人》刊物撰写一些时事文章，并积极参加学校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会。1900年离开格罗顿时，富兰克林象其他毕业生一样，坚信美国能在世界事

务中起某种有益的作用。²

然而,只有再过十二年之后,他才真正对这一信念作出有意义的阐述。虽然他曾两度到加勒比海地区旅行,三次周游欧洲,继续对世界事务发生兴趣;但从1900年到1912年他所关心的事主要还是他个人方面的:在哈佛大学的社交和课外活动、婚姻、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以及且夕不忘有朝一日达到很高的政治地位。他是一个相信自己将享有社会盛名的雄心勃勃的年青人。

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信念,一部分是由于他对自己贵族出身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他的母亲”,一位传记作者曾写道,“能够详述大概包括一半欧洲贵族和所有赫德森河谷的贵族家谱,至少,萨拉能够说出十来个同富兰克林有联系的十二个五月花世家后裔的名字。”富兰克林十分容易地从他母亲那里得到这些常识,而且,他在哈佛大学上学时,通过自己的查考,增写了这个家谱的内容。³

他的幼年同样赋予他丰富的自信。他是父母美满良缘的独生子,这个家庭看来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没有兄弟姐妹同他在父母面前争宠,同他抢夺玩具,或带他走出父母的安乐窝去过学校生活和上运动场。”父亲对他倾注了全部的注意力,宛如“一个知心的指导人和游伴”,亲切、深情地教他滑雪、溜冰、驾雪橇、骑马、钓鱼、扬帆行船和耕作。萨拉也溺爱他,几乎把他每天所取得的成绩都写进日记。一篇有代表性的日记这样写道:“富兰克林在早饭前出去,打了两只蓝色的小鸟,一只作为标本收藏,另一只送给了马丁。”富兰克林的每件事她都要操心:她保存着他孩提时穿的衣服、信件,甚至考试卷,“仿佛认为这些东西将对他的后代有重要的意义似的”。⁴

他同家庭之外的人们接触越多,就越发加强了他的优越感。到他五岁时,就已见过美国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包括白宫的格罗

弗·克利夫兰*总统。在格罗顿开始接受正规教育时,他发现自己列入社交名册的家庭子弟中的佼佼者。在哈佛大学,他轻而易举地加入了波士顿—剑桥社。大学第二年,他的堂兄西奥多·罗斯福当选了美国总统,两年半后他同总统的甥女埃莉诺·罗斯福结了婚。1907年,富兰克林理所当然地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加入著名的华尔街法律事务所——卡特、莱迪亚德和米尔本联合事务所。

当富兰克林琢磨他自己与众不同的同时,他也使自己精于指挥和领导。萨拉·罗斯福有一次曾说:“他的父亲和我总是对富兰克林寄予极大的期望,就象我的父亲总是对他的儿子们寄予莫大期望一样,而且他们也的确没有辜负他的希望。我们认为他应当能取得优胜,一旦他确实成功时,我们很高兴,但并不吃惊。总之,他有许多其他孩子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

有件事情足以证明富兰克林从孩提时起就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有一次,当他的母亲责备他不该命令小伙伴围着他转时,他回答道:“妈妈,如果我不下命令,那就一事无成了!”在格罗顿和哈佛大学时,他同别人激烈竞争,并多次力图赢得最受学生尊重的体育奖章。尽管脆弱的体格迫使他处于他和他的同学们都认为是第二流的地位——格罗顿棒球队队长和哈佛大学的《克里姆逊报》的编辑职位——他还是“几乎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这些岗位上工作,显示了他为争取更高的地位而努力的“强烈的劲头”。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曾经写道:“我回顾罗斯福的生涯时,认为他最令人震惊和始终如一的特征,乃是他心里有一团燃烧着的烈火。”

* 格罗弗·克利夫兰,民主党人,1885年—1889年为美国第二十五届总统,1893年—1897年再任美国第二十七届总统。——译注

** 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系罗斯福的智囊成员之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33年起成为罗斯福工作班子的人员,农业调整法制订人之一,历任农业部副部长(1934—1937)、波多黎各总督(1941)、芝加哥大学学部委员,写过许多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译注